

● 多声道

论中国人的忧郁

——一个基本框架式的尝试

[德] 顾彬

与时间和回忆一样,忧郁(Melancholie)也在西方时兴起来。① 1998年的时代转折迅速将这种伤感带回知识分子的思索和学术书籍之中,而且——人们几乎要视之为现代和后现代的最终胜利②——是以一种双重的方式:一方面是(社会主义)乌托邦终结的继续,另一方面作为取消了几十年间不断发布的忧郁禁令(Melancholieverbot)之后的一种自然事变。或许有人会责难于我,说我在还没有结束对时代③和回忆④问题的讨论之前,再次转向一个时髦的命题。情况并非如此,时代、回忆和忧郁是互相不可分割的,这使我陷入困境,不得不违犯常规,即更多从个人的而非科学的角度继续讨论。

有两件事情在儿童时期时常纠缠着我,一是人为何悲伤,二是死亡的确定性。我不知早期惶恐的这种非儿童的形式之原因何在。我记得昏暗的房间以及祖母讲述的纳粹罪行。那是在策勒,从那个时候起,我把作为一个德国人不仅看成一种惩罚,而且视作一种耻辱。几十年过去后的今天,前一个问题保留了下来,当然它如今更具体了,即:人究竟为什么会悲伤,因为他并非如庄子所言⑤与忧俱生,而是由身体的温暖到手的温暖。那么,在通往忧伤的路上必然发生某些事,问题在于:什么事。

几时思考的第二个对象却发生了变化。死亡在我看来不再可怕:我们只不过是地球为了迎候上天而装扮自己的衣物。尽管如此,且请现在就宽容我,我的下一个大的论题还是死亡。我今天更为感兴趣的是:人为什么要回忆?更重要的是,他何时开始回忆?认为人早就在回忆是错误的。他只是到了很晚的时候才这样做,正如一个自杀者留下告别信也不过是几百年以前(自1576年起)⑥的事。忧伤史的情况或许类似,或许伤感的恶魔是随着西方近代的开始,才最终不可扭转地进入人的身体与灵魂的,而且这也许与基督教的传播不无关系。

人为什么悲伤?他的悲伤是否与回忆有关?我想以一种表面上似乎不允许的方式进一步举例说明我的问题。作为众多自我同一性典范中的一个,战后的德国在五十年代为自己创造了布比·朔尔茨(Bubi Scholz)这一形象。孩提时期,我像其他许多人一样也想成为和这位拳击偶像一样的人。后来这位欧洲冠军变成了一个酗酒者,并终于在酒醉后杀死了他的妻子,他如今患有忧郁症,只能依赖药物来维持安静。假如我们遵循《圣经》,就此很容易就找到一个答案:倘若你赢得了世界,却又损害了你的灵魂,于你何益?战胜世界并不能保护个体不受午间恶魔的侵扰。这一点也适用于毛泽东,他长达几周地呆在床上,以缓解自己的恐惧状态。为什么胜者终究也难免遭受绝望之苦呢?

依照古瓦迪尼(Romano Guadini)的看法,人的不幸(Unglück)来自于与神圣者的分离⑦;与此相应,埃里阿德(Mircea Eliade)认为,幸福(eudaimonia)是对神的状态的模仿⑧。这两种情况都是回忆——确切地说是集体记忆——在起作用。我们回忆一种曾经存在过的、敦促改进的状态,回忆伟大的时代与神话中的安全状态。对于个人和团体,运动是在胜利的短暂经历中重新建立统一体的快捷而廉价的可能性。因自希腊人起,胜者就被视为如神一般⑨。因此,可以把二十世纪公众意识中体育运动的支配地位理解为重建团体(宗教)仪式行为的徒劳的尝试,这种行为替记忆重新开辟了通往参与原始典型的路。这样,整个民族共同经历的体育运动